

曼德施塔姆夫人 回忆录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俄)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 译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曼德施塔姆夫人
回忆录

(俄)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刘文飞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Copyright©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970, 19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著;
刘文飞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9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 7 - 5495 - 3856 - 0

I. ①曼… II. ①娜… ②刘… III. ①曼德施塔姆, N.
(1899 ~ 1980) - 回忆录 IV. ①K835.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0892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邮政编码:256401)

开本:690mm × 960mm 1/16

印张:33.5 字数:42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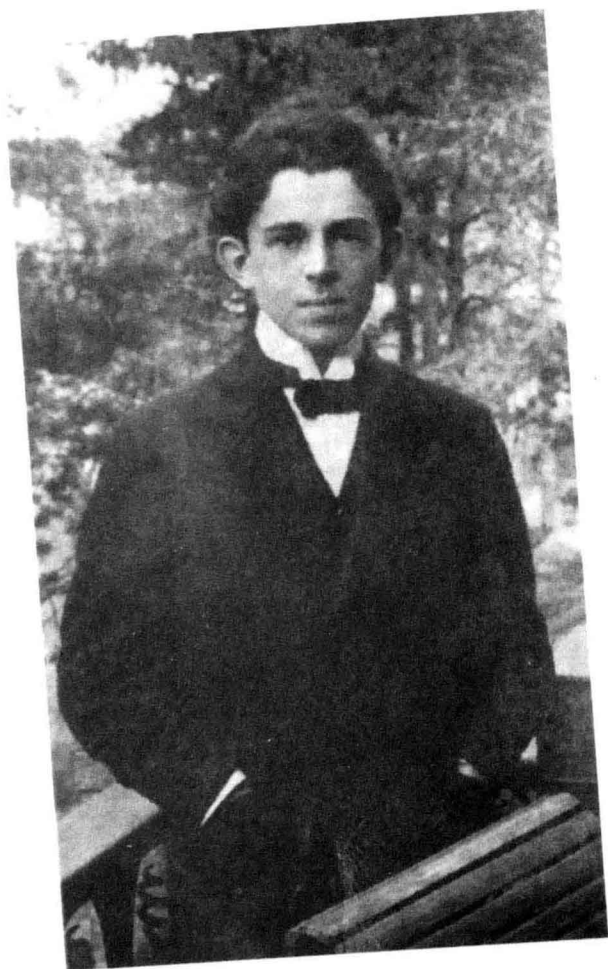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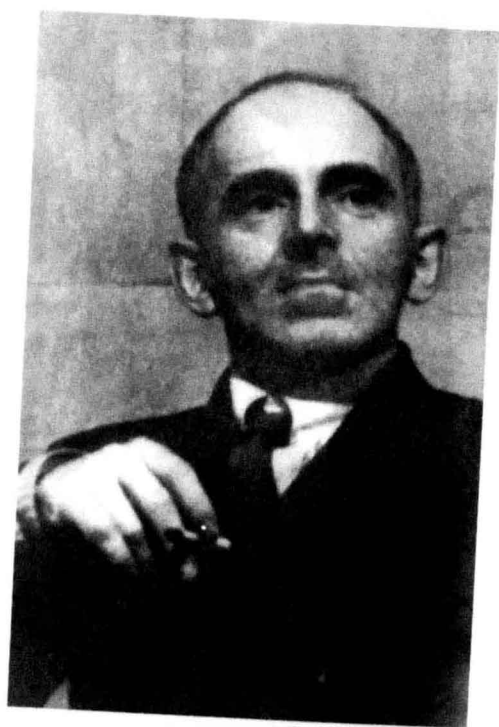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莫·所·纳佩里鲍姆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1900年底至1910年初)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
(1935年)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利·雅·金兹堡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娜·雅·曼德施塔姆（前排居中者）在后贝加尔师范学院的师生之间
（赤塔，1953年）

中译本序

刘文飞

一

任何一种文学,说到底都是记忆的结晶和产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等自不待言,就连那些描写作家所处时代之生活的文字如普希金的《驿站长》和高尔基的《母亲》等,甚至那些预言未来的作品如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扎米亚京的《我们》等,也莫不是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现实感悟的结果。任何一种文学,也注定是两种性别记忆的合成,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男性记忆和女性记忆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或许有所不同。

女性记忆与俄国文学,或曰俄国文学中的女性记忆,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学史话题。俄国女性的声音很早便响彻俄国文学,比如《伊戈尔远征记》中伊戈爾的妻子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发出的“哭诉”,《乌莉雅尼娅·奥索里英娜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音容笑貌,大司祭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中阿瓦库姆的妻子对丈夫的相随之举和激励之言等等。到了叶卡捷琳娜在位时期,在这位爱好文学、标榜开明的女皇的“恩准”和支持下,俄国文学中的“女性写作”正式出现,叶卡捷琳娜本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视为俄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作家。然而,在俄国十九世纪辉煌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女性作家的身影却一直

被自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一大批男性文学巨人所遮蔽,构成世界文学史中三大高峰之一的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创作主体而言似乎就是一种“男性文学”。直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白银时代”兴起之后,随着吉比乌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苔菲等杰出女性文学家的涌现,俄国文学中的性别构成才开始发生改变。在整个二十世纪,乃至苏联解体之后的俄国文学中,无论是作为创作的主体还是作为描写的对象,女性都越来越突出地显示了她们的存在。

综观俄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与其他民族的女性写作者一样,俄国女性的创作优势主要体现在抒情诗、戏剧和短篇小说等体裁领域,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她们似乎也很擅长另一种写作形式,即回忆录。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回忆录,其最主要的体裁特征恐怕就在于“回忆”,在于“记忆”。回忆录属于纪实文学和自白文学范畴,它介乎于自传体小说和书信日记等纯纪实文字之间,表现为社会政治和文学文化生活的参与者或见证人关于往昔历史、人物事件的追忆和叙述,思考和评说。这一写作方式以史实性和客观性为基础,同时也要求表达上的画面感和文学性。“回忆录”在俄语中被称为“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有时也称作“мемуары”,后一种说法更像是外来词),它多以复数形式出现(单数形式则表示“记忆”、“想起”等义),它在英语中的对应形式至少有五个,即 remembrances, recollections, reminiscences, memoirs 和 memorials,这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俄国文学中的“回忆录”形式是含义丰富甚至包罗万象的。俄国作家在写作回忆录时往往不再另拟题目,而直接冠以“воспоминания”的字样,他们或许以为,这样的书名最能概括他们纷繁多样的记忆和感受。

“回忆录”这一文学体裁源远流长,西方文学中最早的回忆录文学可追溯至色诺芬的《远征记》,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阿伯拉尔的《我的受难史》和但丁的《新生》等,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大家更是写有许多不朽的回忆录名篇,如卢梭的《忏悔录》和歌德的《诗与真》等等。而在俄国,回忆录这一文学样式的历史几乎与俄国文学的历史一样悠久,阿瓦库姆的《生活纪》便可被视为这一体裁的古代样板。此后,文学回忆录性质的名作便在俄国文学中频繁

出现,几乎每位俄国文学大家都留下过自己的回忆性文字,其中一些作品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经典名著,如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索尔仁尼琴的《牛犊抵橡树》、布罗茨基的《小于一》等等。

如前所述,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起,俄国女性作家开始与男性作家平起平坐,逐渐在抒情诗等短小体裁领域占得半壁江山,而在大型体裁领域,回忆录则是她们最为擅长的形式,她们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足以与男性作家相匹敌的创作能力和实绩。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回忆录作家或许就是娜塔莉娅·鲍里索夫娜·多尔戈鲁科娃,她本意是写给自家子孙们看的《亲笔手记》(1767)后于一八一〇年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在俄国社会引起广泛的阅读兴趣。俄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名作,则或许是帕纳耶娃那部写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面世于一八八九年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翔实生动地描写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腾飞时期的文坛,形象地刻画出包括普希金、别林斯基、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内的众多文学人物肖像,向后人提供出一份宝贵的文学史史料。在她写作此书前后,许多俄国大作家的配偶也开始写作此类文字,不过这些“遗孀回忆录”大都面世较晚,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其《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二五年;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托尔斯泰娅的《我的一生》迟至一九七八年才被整理出来发表。

由帕纳耶娃奠定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传统在二十世纪大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它们或为女作家、女诗人本人的自传性文字,如茨维塔耶娃的《我的普希金》(1937)、苔菲的《我的编年史》(2005年发表)和阿赫马托娃的《自传随笔》(1955—1966)等,或为他人关于女作家、女诗人的描写,如利季娅·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1976)等,但更多的女性文学回忆录则是女作家们主观体验和客观见闻这两种成分的合成,作者们既写自己也写他人,既展示历史场景也袒露个人情感。二十世纪的俄国女性文学回忆录名篇还有吉比乌斯的《鲜活的面孔》(1925)、利季娅·金兹堡的《险峻的道路》(1967)、奥多耶夫采娃的

《涅瓦河畔》(1967)和《塞纳河畔》(1983)、别尔别罗娃的《着重号为我所加》(1972)以及艾玛·戈尔施泰因的《回忆录》(1998)等,这些作品或前后衔接,或相互呼应,共同构建出一座俄国女性文学记忆的金色宫殿。

在这座女性文学回忆录的宫殿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无疑占有一个重要位置。这部回忆录的写作和发表、内容和风格、传播和影响均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地体现出了女性记忆在俄国文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功能和影响。

二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Надежда Яковлевн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是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施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是俄国白银时代阿克梅诗派的最重要代表,也被视为二十世纪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曼德施塔姆于一八九一年一月三日出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彼得堡度过少年时代,在彼得堡杰尼舍夫学校上学时开始写诗,后去法、德等国留学,受到西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影响,一九一一年回国后接近古米廖夫,一九一二年撰写《阿克梅主义的早晨》一文,从而成为阿克梅诗派的主将之一。一九一三年,他出版第一部诗集《石头集》,其诗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冷峻的诗歌意象和优雅的韵律结构让人耳目一新,使他迅速成为俄国诗坛的重要诗人,与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并列为阿克梅诗派的“三驾马车”。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一八年,曼德施塔姆与契卡特工勃留姆金发生冲突,后被迫前往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等地,据说他在南方屡遭不幸,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所逮捕,直到二十年代初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居无定所的曼德施塔姆却迎来自己创作上的一个高峰,相继出版诗集《忧伤集》(1922)、回忆录《时代的喧嚣》(1925)、文论集《论诗歌》(1928)以及一些译作。坚持个性并反对专制、认为诗歌高于任何价值的曼德施塔姆,似乎注定会为新现实所不容。一九三三年,曼德施塔姆写了

一首影射斯大林的诗；一九三四年，他又与当时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阿·托尔斯泰爆发冲突。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曼德施塔姆第一次被捕，被判处三年流放，流放地是北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他在那里跳楼自杀未果。在布哈林等人的斡旋下，曼德施塔姆的流放地被改在沃罗涅日，他在此地迎来另一个诗歌创作高峰，他写在三个“沃罗涅日笔记本”中的诗作后被妻子和朋友们保存下来，成为二十世纪俄语诗歌中的珍品。一九三七年五月，曼德施塔姆夫妇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又再次被捕，并被流放至苏联远东地区。一九三八年年底，他死于海参崴附近的一座集中营。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出嫁前姓哈津娜，她一八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生于萨拉托夫，与曼德施塔姆一样出身犹太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医生。二十世纪初，哈津一家迁居基辅，一九〇九年，娜杰日达进入基辅一家私立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曾随父母多次旅行德、法、瑞士等国。中学毕业后，娜杰日达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法律系，但未及毕业，便转入著名画家埃克斯特的画室学画。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娜杰日达在基辅一家咖啡馆结识曼德施塔姆，由此开始了一位著名诗人和一位年轻女画家之间的罗曼史，三年后他俩结婚。但是，这位著名的诗人带给他妻子的却是无尽的磨难，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的短暂平静之后，她不得不先后面对曼德施塔姆的两次被捕，这位被丈夫称为“黑暗岁月的同志”的妻子，仅与丈夫共同生活了十六年，其中的最后四年还是在流放地度过的。在曼德施塔姆死后，娜杰日达独自一人又活了四十余年，在其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始终居无定所，一无所有，像个逃犯一样东躲西藏。布罗茨基在她去世后写的“悼词”《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一文中这样写道：“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到危险讯号便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

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像对她自己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依靠阿赫马托娃的帮助被疏散至苏联中亚地区。一九四二年,她通过大学的自学考试,开始在一些地方教授英语,一九四四年五月正式成为国立中亚大学的英语教师。一九四九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来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在当地的师范学院任教,但在一九五三年意在排挤犹太知识分子的“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赶出校门。之后,她几经辗转,又先后任教于苏联远东地区的赤塔师范学院和切博克萨雷师范学院。一九五六年,她在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的指导下于国立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完成研究生课程,获得英语文学专业的副博士学位,这一年她已年近六旬。一九五八年,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退休后迁居塔鲁萨。当时有一项特别规定,即刑满获释的政治犯及其他可疑分子不得定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周边一百公里范围以内,于是,像塔鲁萨这样的莫斯科周边小镇便成了异见知识分子们的集聚地。在莫斯科远郊的这个小镇上,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开始写作她的《回忆录》。一九六一年,她的一些文字以“娜·雅科夫列娃”为笔名发表在由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潘琴科等创办的地下文学杂志《塔鲁萨之页》上。一九六二年,为生活所迫,她再次走上讲台,在普斯科夫师范学院又教了两年英文,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随着政治气候的逐渐宽松,她终于回到莫斯科,并得到一间一居室住宅。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她虽然深居简出,可她位于莫斯科城乡结合部的那间小屋却成了莫斯科的地下文化中心之一,西尼亚夫斯基、沙拉莫夫和阿赫马杜琳娜等著名作家和诗人是这里的常客,爱好曼德施塔姆诗歌以及白银时代俄语诗歌的人将这里当成一块“朝觐之地”,许多俄国境外的斯拉夫学者也时常慕名前来造访这位诗人遗孀。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卒于莫斯科。

三

曼德施塔姆夫人在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名声和地位,主要就源自她

的回忆录,换句话说,就源自身为遗孀的她关于其丈夫的回忆,源自她关于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学记忆。

如前所述,曼德施塔姆夫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回忆录,她一直写到去世,相继出版的回忆录共有三部,即一九七〇年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的《回忆录》(Воспоминания),以及由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八年首版的《第二本书》(Вторая книга)和《第三本书》(Третья книга)。这三本书被合称为“回忆录三部曲”。第一部《回忆录》的主要追忆对象是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之间(1934—1938)他们夫妇俩的生活遭际。《第二本书》的写作大约开始于阿赫马托娃去世(1966)前后,曼德施塔姆夫人在阿赫马托娃离去后想写一部关于她这位“终生女友”的书,《第二本书》中因而有较多关于阿赫马托娃的叙述;《第二本书》的第一节题为《我》,作者也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宣称,她在前一本《回忆录》中已经谈了太多关于曼德施塔姆的话,这一次她打定主意要多谈一谈“自我”。较之于第一部回忆录,《第二本书》让记忆的触角伸得更远一些,作者从她一九一九年与曼德施塔姆的相遇写起,也更多地忆及自己的少女时代。《第二本书》的篇幅远远超出第一本,涉及的人和事也更多更杂,然而,我们在读完全书后会发现,关于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追述依然是《第二本书》的主线,其分量远远超过关于阿赫马托娃、关于作者“自我”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本书》这个书名本身即取自曼德施塔姆,一九二三年,曼德施塔姆曾将自己的一部诗集取名为《第二本书》。同样,《第三本书》的题目也能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曼德施塔姆“沃罗涅日时期”的《笔记本第三册》,以及曼德施塔姆一九三一年写作的那篇自传性散文《第四篇散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始终是紧紧围绕着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创作而展开的。至于《第三本书》的内容和结构,我们通过该书出版者所给出的简短前言便不难获悉:“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完成她的第二本回忆录,履行了伟大诗人之遗孀和俄国恐怖年代见证人的使命,之后便似乎无事可做了。朋友们开始努力劝说她把回忆录继续写下去,写一写她在认识曼德施塔姆之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听从大家的意见,写了三篇关于父母和家人的特写,但是这项工作

却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她年迈多病,对曼德施塔姆出现之前的年代也无太大兴趣,这使得她的‘第三本书’一直没写出来。同样还是这些朋友……认为应该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留下的文字整理为一个集子。此书就是对这一愿望作出的回应。本书包含多种不同材料。主体部分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之前对曼德施塔姆莫斯科时期和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所作的批注,这些批注之前从未发表。围绕这条主干,还收入了她的一些批评文章、自传章节(部分曾发表)和写给境外友人的书信。为了更充分地展示娜·雅·曼德施塔姆的创作全貌,我们决定将她最初试笔的三篇特写也收入此集,这三篇特写曾以‘娜·雅科夫列娃’为笔名刊于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最具特色、最为大胆的出版物之一《塔鲁萨之页》。”

由此可见,在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三本回忆录中,相对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这第一部。实际上,人们在提起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时,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所指的也往往就是这第一部。这部《回忆录》于一九七〇年发表后迅速被译成欧美多种语言,不断再版。苏联解体后,这部作品于一九九五年在俄罗斯境内面世,先刊于《新世界》杂志,后又由多家出版社推出,每隔数年便有一个新版本问世。

总括地看《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发现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的内容构成,其一是关于诗人曼德施塔姆及其诗歌的回忆,其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本质的反思。

曼德施塔姆是俄国诗歌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他在十月革命后却逐渐失声,一九三八年去世后,他更是在文学界和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他的一些诗作后来在“解冻”时期陆续发表,国外也相继有他的作品和关于他的文字面世,但是,真正为曼德施塔姆在文学上“恢复名誉”的,还是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在曼德施塔姆重新被发现、被接受的过程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及其回忆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曼德施塔姆被捕的那个夜晚,曼德施塔姆夫人就暗暗为自己确立一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在那个五月之夜,我还明确了这样一个任务,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

奥·曼^①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的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值得为此保持体力。”^②曼德施塔姆夫人最终完成了这一使命:在丈夫被捕之后,她将藏匿、保存丈夫的诗作当成生活的主要意义;在丈夫被流放后,她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两人共同整理曼德施塔姆的新旧诗作;在丈夫去世之后,支撑她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能出版并宣传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遗产;而在时代相对宽松、生活相对稳定之后,她又开始撰写以曼德施塔姆为“主人公”的回忆录。一位当年曾目睹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如何反复背诵、整理丈夫诗歌遗产的人这样写道:“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的记忆不仅是保存其夫未发表诗作的一座宝库,它还是曼德施塔姆学的中心,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展开。在记忆的深处,或许是在潜意识的深处,各种不同版本被一一搜寻出来,得到编辑,在一番比较、评估和筛选之后,确定了最终版本。”^③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夫人调动、翻拣、整理并归纳她的记忆,为我们还原出一个活生生的曼德施塔姆。在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曼德施塔姆的特征和形象:“那种使奥·曼备受折磨的哮喘,在他这个冬天许多诗作的格律中竟然也有所体现。”(《双重枝桠》)“战时被疏散期间,我在塔什干遇见兴致勃勃的卡塔耶夫。走近阿拉尔斯克,他看见一匹骆驼,便立刻想到曼德施塔姆:‘瞧它挺着脑袋,完全像是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旧与新》)我们能获悉曼德施塔姆的行为和性格:“可我在他还健在时即已明白,诗歌和散文似乎在确定他的行为,更确切地说,他道出的许多话于他而言都像是誓言。”(《意大利》)“奥·曼会随时道出这样的反常话语,或在编辑部,或在演讲时(自然总是不公开的演讲),或在私下的交谈中,这便派生出许多传闻,说奥·曼的性格让人难以忍受,其实,他只不过有点偏执而已。奥·曼的偏执足够十个作家用,但遗憾的是,这种品质并不是凭票供应的……”(《只读一本书的读者》)我们能了解曼德施塔姆的友人和交际圈:“奥·曼一生中仅有的几缕阳光

①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名字和父称的缩写形式。

② 见本书《晨思》一节,下引此书仅注明章节。

③ 见《同时代人讲述曼德施塔姆夫妇》,俄文版,2001年,页366。

均归功于布哈林。”(《传送带》)曼德施塔姆和阿赫马托娃“这两个最不幸的人终生不渝的友谊或许就是唯一的奖赏,奖赏他们各自的痛苦劳作和痛苦经历”。(《喙动和絮语》)我们能理解曼德施塔姆的诗歌观和世界观:“‘诗歌就是权力。’奥·曼在沃罗涅日曾对安娜·安德烈耶夫娜^①说道。”(《价值重估》)我们甚至能目睹他具体的作诗方式和他的臆想症病态:“运动,是我判断他开始工作的第一个征兆;第二个征兆则是喙动的嘴唇。他在诗中曾说,他喙动的双唇无法被剥夺,他的双唇即便在地下也依然会喙动……结果的确如此。”(《喙动和絮语》)“在切尔登散步时,他在沟沟坎坎里四处寻找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的尸体。”(《错觉》)其结果,正像布罗茨基在他谈论曼德施塔姆的《文明的儿子》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两本回忆录当然是阅读曼德施塔姆诗歌的指南,但是其意义不仅于此。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奥西普·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好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得到再现。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曼德施塔姆的诗歌,用他的死亡过程和他的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一位哪怕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仅凭那朝向他的恶所具有的数量和能量。”

在上引这段布罗茨基的话中,有两个词组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布罗茨基认为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是一部“伟大的散文”,“近乎一次复活逝者的举动”。也就是说,曼德施塔姆夫人用自己的记忆复活了自己的丈夫,复活了一位诗人;更为重要的是,她通过曼德施塔姆又复活了一个诗歌时代,甚至复活了一个历史时代。

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作为个人的诗人与作为集体的社会似乎注定要产生

① 即阿赫马托娃。